

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

张书维^{1,2} 王二平² 周洁²

(¹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²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群体性事件是当下我国典型的集群行为。本研究通过实验室情景设计的方法, 考察了跨情境下群体相对剥夺如何通过群体认同作用于集群行为, 及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 1) 同一触发情境下, 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的个体在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下有更强烈的集群行为参与(意向)。这源自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不同水平下群体效能与集群行为意向之间的二次调节。对于特定群体认同凸显的个体, 无论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高低, 都有较高的集群行为参与(意向)。这当中, 群体愤怒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2) 不同触发情境下, 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出现差异。该调节作用仅出现在利益无关情境中。此外, 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有区别: 在利益无关情境中, 群体愤怒的影响显著大于群体效能; 在利益相关情境中, 群体效能与群体愤怒的影响无显著差异。本研究扩展了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并为政府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供思路。

关键词 群体相对剥夺; 群体认同; 利益相关触发情境; 利益无关触发情境; 集群行为

分类号 B849:C91

1 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已进入人均 GDP 从 1000 美元向 3000 美元过渡的关键阶段, 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 各种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凸显(李培林, 2005; 马静玉, 2005)。这其中, 群体性事件可以看作是社会矛盾的突出表征: 从 1993 年到 2003 年这十年间, 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 年平均增长 17%; 规模不断扩大,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年均增长 12%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2004)。2006 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 6 万余起, 2007 年猛增至 8 万余起, “2008 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2008)。“2009 年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仍然呈现数量增多的态势”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2009)。“时至今日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依旧居高不下”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2010), 因为产生群体性事件的宏观社会和经

济环境短时间内不可能根本改变(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0)。有学者认为, 至少到 2020 年都将是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王晓东, 2006)。

群体性事件对于社会稳定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2004 年的重庆万州事件、2008 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甘肃陇南事件, 2009 年的湖北石首事件和吉林通钢事件等, 无一不对当时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现有研究多以思辨为主, 缺乏实证检验。

1.1 群体性事件与集群行为

“群体性事件”原本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 最初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出现在官方言论和文件中, 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 表达也不统一(于建嵘, 2009)。常见的群体性事件, 往往表现为不满群众围攻当地政府机关, 损毁公务用车等(O'Brien, 2002)。王二平(2009)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 部分群

收稿日期: 2011-08-12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731004)、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KSCX2-EW-J-8)。

通讯作者: 王二平, E-mail: wangep@psych.ac.cn

众与当地党政部门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这里所说的强势社会集团,泛指当地的国有或民营企业。但它们行为的背后,总能看到当地党政部门意志的影子。此定义就将群体性事件与流氓群殴、村里间宗族间冲突、一般的民族或宗教冲突、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或宗教矛盾挑唆对抗党政部门的冲突以及一些国家的社会骚乱等明确区分开来,从而凸显其官民冲突的本质。可以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民众在现行体制外的一种利益诉求方式。

群体性事件是当下我国典型的集群行为(collective action/behavior)(张书维,周洁,王二平,2009;陈浩,薛婷,乐国安,2010;弯美娜,刘力,邱佳,杨晓莉,2011;秦强,郭星华,2011)。所谓“集群行为”,是群体成员参与为改善群体现状的行动(Wright, Taylor, & Moghadda, m, 1990; Wright, 2009),是一种共同情绪影响下的个体行为(Park & Burgess, 1921)。比如投票,请愿,罢工,抗议,示威等(Walker & Smith, 2002)。最早关注集群行为现象的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 Le Bon (1895/1995),他在著作中使用了“乌合之众”(crowds)一词,对集群的非理性行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 Park 和 Burgess (1921)则首先明确提出了“集群行为”的概念。社会心理学认为,对抗性的集群行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化解,有可能发展为行动目标更为明确、组织性更高的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和社会革命(Tajfel, 1982)。这三类群体行为都是体制外的政治行为,但在目标的明确性和行动的组织性方面有层次差异(赵鼎新,2006)。因此,探明集群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不仅有助于理解群体性事件动力学特征,也可以为化解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提供技术支持。

在群体性事件中,对立的双方壁垒分明——愤怒的人群与当地党政部门或强势社会集群对峙。而集群行为的参与者却往往边界模糊——无论诱发因素是否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愤怒而无助的人都以各种行为表达参与和支持,希望借此改变其所在群体的弱势地位或不利局面。从中可以觉察到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 RD)、群体认同(group/collective identity)、群际情绪(intergroup emotions)、群体效能(group/collective efficacy)等社会心理过程。然而,这些社会心理过程在集群行为的动员中如何发挥作用?群体性事件中的集群行为又有哪些特征?

集群行为是社会变革的核心机制之一,故向来

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实践家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van Zomeren & Iyer, 2009)。Park 之后,更多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都从不同角度揭示集群行为的发生机制。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因素使得人们(愿意)参与集群行为?”(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认同、认知、动机和情绪等典型的心理过程(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09)。

1.2 群体相对剥夺

Stouffer, Suchman, DeVinney, Starr 和 Williams (1949)最早发现,现实中个体的生活和工作满意感并非依赖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周围的人作为参照进行评价。比较的结果若是自己处于较低地位,就会产生相对剥夺。相对剥夺的核心社会心理过程是社会比较(Zhang, Wang, & Chen, 2011)。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普遍大为改善,但社会上贫富差距也愈加突出,公众的不满情绪并未减少。“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所表达的,就是相对剥夺(张书维等,2009)。

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界定相对剥夺概念。社会心理学更多地从微观社会个体和群体的角度来理解相对剥夺,关注个体和群体在面对客观剥夺时的主观感受或行为表现。Walker 和 Smith (2002)将相对剥夺定义为:与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相比,个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感知。参照群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根据参照群体的不同水平,相对剥夺可分为个体相对剥夺(egoistic/personal/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 IRD)和群体相对剥夺(fraternal/collective/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GRD) (Runciman, 1966)。前者所作的是人际比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后者所作的是群际比较(intergroup comparisons; Taylor & Lind, 2002)。一旦个体感知到相对剥夺,就会由此引发一系列情绪及行为反应(Mark & Folger, 1984),如沮丧,压力,并可能导致向更高社会地位群体的流动等个体行为(Mummerdey, Kessler, Klink, & Mielke, 1999; Smith & Ortiz, 2002; Pettigrew, 2002; Taylor & Lind, 2002),而非集群行为。

以往研究主要采用自陈式的问卷调查法测量相对剥夺。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有:工资收入(Foster & Matheson, 1995)、种族社会地位(Wright &

Tropp, 2002)、总体经济状况(Pettigrew, et al., 2008; Pettigrew & Meertens, 1995)、生活状况(Tropp & Wright, 1999; Zagefka & Brown, 2005)等。极少有操纵相对剥夺的研究。Guimond 和 Dambrun (2002)通过情景设计(scenario)的范式,让心理系的大学生被试阅读一段反映“心理系毕业生与本校经济系/法律系毕业生相比,在就业前景方面存在差异”的材料来诱发其群体相对剥夺,取得预期效果,但仍缺乏对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操纵。总之,研究者多将群体相对剥夺作为一个背景因素,而非操纵的变量。大量研究表明,与个体相对剥夺相比,群体相对剥夺更易导致集群行为(Abeles, 1976; Crawford & Naditch, 1970; Dion, 1986; Dubé-Simard & Guimond, 1986; Guimond & Dubé-Simard, 1983; Hafer & Olson, 1993; McInnis & Grant, 1991; Miller, Bolce, & Halligan, 1977; Walker & Mann, 1987; Smith & Ortiz, 2002; Smith, Cronin, & Kessler, 2008; Taylor & Lind, 2002; Wright & Tropp, 2002; Vanneman & Pettigrew, 1972)。尽管如此,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之间的相关至多也仅维持在中度水平(Walker & Smith, 2002; van Zomeren, et al., 2008)。仅有群体相对剥夺的存在,尚不足以立刻引起广泛的反抗(张书维等, 2010)。可见,群体相对剥夺只是个体发动或参与集群行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感受到相对剥夺时,个体可有多种选择以求改变自己的不利社会地位:通过努力改变个人地位;改变参照群体以消除相对剥夺感;攻击社会地位高的群体以泄愤。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的关系?换言之,有哪些可调节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关系的因素?

1.3 群体认同、群体愤怒、群体效能

现实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成员也只有小部分参与集群行为,绝大多数尽管伴随着愤怒、不满及沮丧等消极情绪,但仍然会选择沉默和忍受(Wright & Tropp, 2002)。因此,还需确定有关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关系的调节或中介变量。群体认同被认为是一个核心影响因素(van Zomeren, et al., 2008)。

Tajfel (1978)将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界定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来源于个体对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认识,同时认识到作为该群体成员所能获得的情感 and 价值意义”。群体认同源自社会认同,指个体与群体基于群体成员身份意义的心理联系,也就是说,群体成员身份整合进个体自我概念

的程度(Tropp & Wright, 2001)。群体认同越高,自我概念中的社会性(sociality)越发凸显;自然地,群体的目标也就内化成了个人所追求的目标。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认为,如果弱势群体的成员面临:1) 群体间地位的差别被认为是不正当的(illegitimate); 2) 群体间地位的区别被视为是不稳定的(unstable); 3) 群体边界是不可渗透的(impermeable, 即低地位群体成员无法加入高地位群体)的情境时,成员会加强对本群体的认同,从而引发谋求改变本群体不利地位的集群行为(Brown, 2000; Ellemers, 2002; Tajfel, 1982; Turner & Brown, 1978; van Zomeren, et al., 2008)。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的预测作用已在反堕胎集会(Hinkle, Fox-Cardamone, Haseleu, Brown, & Irwin, 1996)、行业罢工(Kelly & Kelly, 1994; Veenstra & Haslam, 2000)、农民运动(De Weerd & Klandermans, 1999)、妇女运动(Kelly & Breinlinger, 1995)、同性恋运动(Simon, et al., 1998; Stürmer & Simon, 2004a)、学生运动(Giguère & Lalonde, 2010; Stürmer & Simon, 2009; 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 Leach, 2004; van Zomeren, et al., 2008)及有关实验室生成群体的研究(Branscombe & Ellemers, 1998; Ellemers, Spears, & Doosje, 1997; Wright, et al., 1990)中得到证实。在群体性事件中,群体认同发挥何种作用,还须探明。

对于群体认同和相对剥夺的关系,研究表明,一旦群体认同凸显,弱势群体成员将更倾向于做群际比较,使得成员的个体相对剥夺感下降,群体相对剥夺感上升(Ellemers, 2002; Kawakami & Dion, 1993; Smith, Spears, & Oyen, 1994)。群体认同因此强化了弱势群体成员的群体相对剥夺感(Abrams, 1990; Ellemers, 2002; Mummerdey et al., 1999; Petta & Walker, 1992; De La Sablonnière & Tougas, 2008; Tropp & Wright, 1999),使得群体相对剥夺水平较低而群体认同高的个体也参与到集群行为之中。本研究据此认为,群体认同可能调节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的关系:在群体认同凸显的条件下,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的关系会被弱化,无论群体相对剥夺的程度高低,成员们都更可能参与集群行为;在群体认同被其它凸显的社会认同抑制时,群体相对剥夺对集群行为的预测作用才会显现。

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 IET)承袭了社会认同理论强调自我的社会性这一视角(Smith, 1993, 1999)。群体情绪不同于个体情绪,

它取决于群体认同的程度(Smith, Seger, & Mackie, 2007)。Yzerbyt, Dumont, Gordijn 和 Wigboldus (2002)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显示, 群体认同使部分人经历某一事件时的情绪反应影响到其它内群体成员。当群体认同凸显时, 共享的群体身份成为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若该群体受到威胁(来自外群体)而又有能力对抗时, 易激发成员的愤怒情绪, 即形成基于群体成员身份而生的群体愤怒(group-based anger), 导致对外群体的侵害行为(offensive behavior; Lodewijkx, Kersten, & van Zomeren, 2008; Mackie, Devos, & Smith, 2000; Yzerbyt, Dumont, Wigboldus, & Gordijn, 2003)。愤怒情绪会增加集群行为的冒险性, 使群体成员采取更激进的行为方式(Rydell, et al., 2008)。群体愤怒对于抗议(hostile protest)类集群行为的动员作用尤其明显(Iyer, Schmader, & Lickel, 2007; Leach, Iyer, & Pedersen, 2007; Smith, et al., 2008; Stürmer & Simon, 2009; van Zomeren, et al., 2004, 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08)。Leonard, Moons, Mackie 和 Smith (2011)的新近研究显示, 群体愤怒与群体刻板印象有关, 并通过个体对外群体的歧视评价(discrimination appraisals)来引发集群行为。因此, 群体愤怒可看作是群体认同和集群行为(意愿)的中介因素(Smith & Mackie, 2005; van Zomeren, et al., 2008)。

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RMT)认为群体所能动员的资源是集群行为能否发生的关键(McCarthy & Zald, 1977; Gamson, 1975; Oberschall, 1973; Tilly, 1978)。而群体效能反映的就是成员对本群体所拥有资源的主观认识(Klandermans, 1984)。所谓“群体效能”, 是指群体成员对通过共同努力能够实现群体目标的信念(Bandura, 1995, 1997)。研究证明, 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正相关(Kelly & Breinlinger, 1995; Mummendey et al., 1999; van Zomeren, et al., 2008)。当成员有较高的群体效能时, 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本群体的命运和处境(Drury & Reicher, 2000, 2005; Reicher, 1996, 2001), 参与集群行为的可能性随之增大(Hornsey et al., 2006; Kelly & Breinlinger, 1996; Mummendey et al., 1999)。因此, 即便群体认同非凸显, 只要成员认为集群行为是有效和有益的, 他们仍然有可能参与其中(Doosje, Spears, & Ellemers, 2002; Ellemers, Spears, & Doosje, 1999; Kelly & Breinlinger, 1995; van Zomeren, et al., 2008)。van Zomeren 等(2008)证实了群体认同调节群体效能和

集群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 对于群体认同非凸显的被试, 若其群体效能高, 也会愿意参与集群行为。

本节探讨的 3 个社会心理因素——群体认同、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 是否可能调节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的关系? 抑或暗含更复杂的中介调节(mediated moderator)或调节中介(moderated mediator)变量?

1.4 触发情境

众所周知, 集群行为是在特定的情境(context)下产生的。这里所谓“情境”, 指触发集群行为的各种变量的约束条件统称。最早将情境作为集群行为的必要条件加以探讨的是 Smelser, 在他建构的加值理论模型(Value-added Theory)中, 触发事件是集群行为的直接因素(Smelser, 1962)。后继的实证研究往往将触发情境看成集群行为的背景信息, 而没有作为一个变量来考虑。然而, 在 van Stekelenburg, Klandermans 和 van Dijk (2009)看来, 将微观层面(microlevel)的个体心理与中观层面(mesolevel)的情境特征(触发事件)相结合, 更能反应集群行为的动员机制。该现场研究证明了情境类型(权力导向型/价值导向型, power-oriented/value-oriented)对于个体参与集群行为动机强度的调节作用(van Stekelenburg, et al., 2009)。权力导向型情境与价值导向型情境的区别在于二者的目标差异: 权力导向型下的参与者通过集群行为寻求获得和运用某种影响力; 价值导向型下的参与者则是通过集群行为表达某种价值观念或者意识形态(Turner & Killian, 1987)。Stürmer 和 Simon (2009)根据参与者的个体动机, 将集群行为的情境分为敌意型(hostile protest)和工具型(instrumental protest), 敌意型情境下, 参与者旨在表达对某一外群体的不满; 工具型情境下, 参与者旨在实现某种集群目标。

于建嵘(2009)根据群体性事件在目的、特征和行动指向上的不同, 将其分为集体维权事件, 社会泄愤事件以及骚乱事件三类。集体维权事件主要表现为利益之争, 如陇南事件、孟连事件、通钢事件等; 社会泄愤事件则更多是借机发泄不满, 如万州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与此类似, 王赐江(2010)将群体性事件划分为基于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 基于不满宣泄的群体性事件, 以及追求政治权利的群体性事件三类。基于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利益冲突引发, 目的在于维护、争取和实现自身利益; 基于不满宣泄的群体性事件则无明确利益诉求, 重在发泄不满。

综合中外研究者的观点,本研究认为,通过集群行为参与者的利益是否与触发事件直接相关,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利益相关触发情境(instrumental incidental context)和利益无关触发情境(non-instrumental incidental context)。需强调,这里所谓的“利益无关”,并非完全无关,而是一种间接相关。那些“社会泄愤事件”中,参与者借机发泄的不满,是在以往利益受到损害或漠视积累的,参与集群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其自身所在群体的弱势地位。可以推断,不同触发情境背后的心理机制也是不同的。目前尚无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触发情境作为诱因,其对于集群行为的调节作用值得关注。

1.5 研究问题

从上述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和触发事件情境影响集群行为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以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的关系为主轴,群体认同及与之相关的群际愤怒、群体效能等变量对这一主轴的影响研究局限于心理层面微观机制的探讨,忽略了对心理机制有着直接影响的触发情境这一中观因素的作用。即便是在同一情境下,已有研究也往往聚焦于相同的群体相对剥夺水平。根据心理物理学的基本

定律,相同物理刺激强度所能引起的主观感觉是有明显差异的。故群体相对剥夺的程度对个体选择何种应对方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群体相对剥夺作用于集群行为的表现也可能会因群体认同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另外,同一心理机制的作用在不同情境中可能存在差异。而目前研究中尚缺乏这方面的实证支持。因此,本研究着眼于集群行为的触发情境,探讨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研究问题概括为:

同一触发情境下,群体认同如何调节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的关系? 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怎样作用于这一调节机制?

不同触发情境下,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如何发生改变? 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在其中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通过两个实验进行系统探讨。实验1首先讨论在同一情境下的动因机制(此时情境为控制变量),建立集群行为的一般模型;实验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实验1建立的动因机制在不同情境下是否适用(此时情境为自变量)。

综上,本研究的变量关系示意图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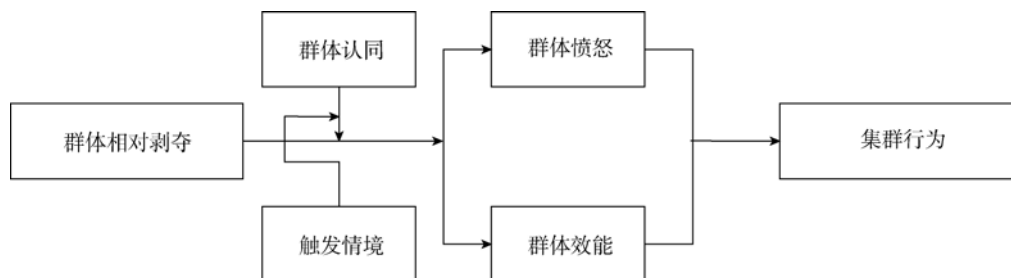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变量关系示意图

2 实验1: 群体相对剥夺对集群行为的影响: 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

对于集群行为的心理机制, van Zomeren 等(2004, 2008)提出了双路径模型(dual-pathway model): 在群体相对剥夺条件下,个体可由两条心理路径表达集群行为的意愿。当群体认同凸显时,通过群体愤怒的中介引发集群行为,这一条是情绪聚焦的应对路径(emotion-focused coping approach);当群体认同非凸显时,如果群体效能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的话,个体仍可能参与集群行为。换言之,群体认同会调节群体效能与集群行为的关系: 对于群体认同非凸显的个体,只要群体效能较高,基于

得失计算(cost-benefit calculations),也会有较强的集群行为意向(Klandermans, 1984; Stürmer & Simon, 2004b)。该模型已在学生运动(van Zomeren, et al., 2008; Stürmer & Simon, 2009)环保运动(van Zomeren, Leach, & Spears, 2010)等集群行为领域得到证实。但该模型仅适用于相同的群体相对剥夺水平。

在集群行为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通过对集群行为意向的测量来替代实际行为。关于个体的态度—行为关系的理论已证明,在难以获得实际行为时,行为意向是与行为最接近的变量(Ajzen & Fishbein, 1980; Albarracin & Wyer, 2001; Eagly & Chaiken, 1993; Fabrigar, Petty, Smith, & Crites, 2006; Jonas, Diehl, & Bromer, 1997)。这一结论是否同样

适用于集群行为意向和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 还需检验。

基于此, 实验 1 提出并检验以下研究假设:

H1: 集群行为意向显著地预测集群行为。

H2a: 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

H2b: 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的关系。

H3: 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不同水平下群体效能与集群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 即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存在一个三阶交互作用。

H4: 群体愤怒中介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关系的调节作用, 即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是通过群体愤怒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

2.1 方法

2.1.1 被试 被试为 119 名北京市 A 大学大三学生。年龄在 18~25 岁($M = 21.86$, $SD = 1.17$), 男 108 名, 女 11 名。所学专业以理工为主。被试是在以“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大学生就业现状及预期”研究的名义招募中自愿参与的。

2.1.2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 2 (群体相对剥夺: 高、低) $\times$ 2 (群体认同凸显: 凸显特定群体认同, 凸显一般群体认同) 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 集群行为意向和集群行为。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个实验条件下, 共 8 组。除一组人数为 14 名外, 其余 7 组均为 15 名。所有实验被安排在同一间大教室内, 整个实验期间被试均独立活动, 单独阅读材料填答问卷, 在实验过程中无互动。故本研究收集和分析的数据仍是个体水平。实验伊始, 主试向被试介绍实验目的(职业生涯规划研究)、规则及报酬等信息。

实验分 4 个步骤:

首先, 对被试进行群体认同显著性的操纵(van Zomeren et al., 2008): 特定群体认同凸显组, 要求被试用文字描述并写下“作为一名 A 大学的学子, 您日常生活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组, 要求被试用文字描述并写下“作为一名高校学子, 您日常生活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为了强化被试凸显的群体认同, 用竖立标准的方式

(Normative fit), 在被试作答完成后, 特定群体认同凸显组每名被试看一张印有“一名 A 大学学子一天之内必做的五件事”的材料; 在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组每名被试看一张印有“一名高校学子一天之内必做的五件事”的材料。阅读这部分材料后填写一份包括群体认同操纵检验及几道填充题(内容涉及职业生涯规划)在内的问卷一。

其次, 对被试进行群体相对剥夺的操纵。向被试分发群体相对剥夺的实验材料, 材料中用文字及图表的形式对 A 大学和 B 大学两校近年来在就业工作方面的投入及效果做了对比, 在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 A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及预期明显低于 B 大学毕业生; 在低群体相对剥夺水平, A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及预期略低于 B 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将 B 大学学生选作 A 大学学生的参照群体, 是因为两校毗邻, 且同为具有行业特色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 在综合实力上旗鼓相当¹。该操纵法借鉴了 Guimond 和 Dambrun (2002) 的范式。被试阅读完这部分材料后, 填写一份包括群体相对剥夺操纵检验, 群体认同测量及几道填充题在内的问卷二。之所以再次测量群体认同, 为的是检查对群体相对剥夺的操纵是否会引起群体认同的变化。

第三, 给被试呈现触发情境的材料。让所有被试在 10 分钟内阅读一个“A 大学部分毕业生因未就业毕业证书被扣”的“真实”事件报道。之后让被试作答调查问卷三。问卷三中包括对群体愤怒, 群体效能和集群行为意向等变量的测量。问卷回收后再收集被试的集群行为, 告知被试: “我们受 A 大学部分同学的委托, 向所有参与本次调查的同学询问是否愿意声援本校未就业毕业生的维权行动。正如大家在之前的阅读材料中所看到的, 他们将于近期采取联名上书校长的方式维权。如果您愿意参与, 请在随后发放的公开信上留下您的姓名以及常用的联系方式。本次调查结束后我们会将所有签过名的公开信汇总, 交至负责同学本人。”发放公开信让被试自愿签名。

第四, 回收公开信, 发放个人信息及保密协议让被试填写。完成后向被试说明真实研究意图, 告知实验材料是虚构的, 求得被试谅解, 并再次郑重强调保密承诺的重要性及保密协议的法律效力。最后给予被试相应报酬(30 元/人)。

¹ 据国内某知名网站发布的最新一期“2010 中国大学排行榜 100 强”中, 总分排名 A 大学高于 B 大学一位(详见 <http://www.cuaa.net/cur/2010/>)。

2.1.3 变量操纵与测量 群体相对剥夺 2 个题项 (Tropp & Wright, 1999; $\alpha=0.71$), 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如“作为 A 大学学子, 您认为与 B 大学学子相比, 在就业方面”选项从“1 非常不利”至“7 非常有利”。反向计分, 分值越高表示群体相对剥夺越明显。

群体认同 3 个题项(Doosje, Ellemers, & Spears, 1995; $\alpha=0.70$), 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如“我将自己视为一名 A 大学学子”; 选项从“1 非常不同意”至“7 非常同意”。分值越高表示群体认同越强。

群体愤怒 3 个题项(van Zomeren et al., 2004, 2008; $\alpha=0.93$), 如“对于 A 大学校方暂扣未就业学生的毕业证、学位证这一做法, 作为一名 A 大学学子, 您感到”选项从“1 非常愤怒”至“7 一点也不愤怒”。反向计分, 分值越高表示群体愤怒越高。

群体效能 3 个题项(同上; $\alpha=0.88$), 如“如果 A 大学的学子联合起来, 能在校方暂扣两证这一事上改变学生的不利局面”, 选项从“1 非常不同意”至“7 非常同意”。分值越高表示群体效能越强。

集群行为意向: “如果××等被校方暂扣两证的毕业生号召 A 大学学子在其上呈校长的请愿书上签名以示声援, 您是否愿意参加?”选项从“1 非常不愿意”至“7 非常愿意”。分值越高表示集群行为意向越强。

集群行为: 被试是否在公开信上签名; 是则计为 1, 否则计为 0。

2.2 结果

119 名被试中, 有 3 名被试部分猜测到实验意图(回答中提及“弱势”、“不利”等字眼); 另有 2 名被试作答不认真, 部分数据缺失。故将这 5 名被试的数据删除。剩余的 114 个有效样本中, 男生 103 名, 女生 11 名。

2.2.1 操纵检验 群体相对剥夺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群体相对剥夺高低两组的群体相对剥夺分数来检验。本实验中, 群体相对剥夺的均值为 4.93 ($SD = 1.06$)。对高低两组的群体相对剥夺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低群体相对剥夺组的分数($M = 4.50, SD = 1.12$)显著低于高群体相对剥夺组($M = 5.35, SD = 0.81$), $t(112) = -4.68, p < 0.001$ 。因此, 实验对“群体相对剥夺”这一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

群体认同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一般群体认同凸显和特定群体认同凸显两组的群体认同分数的高低来检验。由于群体认同进行了两次测量, 将第一次测量所得分数记为 GI_1 ($M = 5.60, SD = 0.83$); 将第二次测量所得分数记为 GI_2 ($M = 5.64, SD = 0.86$)。对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组和特定群体认同组的 GI_1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组的 GI_1 分数($M = 5.37, SD = 0.82$)显著低于特定群体认同组($M = 5.84, SD = 0.78$), $t(112) = -3.13, p < 0.01$ 。这说明实验对“群体认同显著性”这一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另一方面, 对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组和特定群体认同组的 GI_2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组的 GI_2 分数($M = 5.32, SD = 0.90$)仍显著低于特定群体认同组($M = 5.98, SD = 0.66$), $t(112) = -4.38, p < 0.001$ 。再检查群体相对剥夺的操纵是否引起群体认同的变化, 将 GI_1 和 GI_2 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差异不显著, $t(113) = -9.12, p > 0.10$ 。说明实验对群体相对剥夺的操纵并未给被试带来群体认同的显著变化。

2.2.2 描述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相关 由表 1 可初步知晓, 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与因变量—— 集群行为(意向)显著正相关, 稍后的分析中会对这两个变量的作用详加阐述。

表 1 描述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相关(实验 1)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1 群体相对剥夺	n.a.	n.a.					
2 群体认同凸显	n.a.	n.a.	0.001				
3 群体愤怒	5.51	1.16	0.23*	0.26**			
4 群体效能	4.94	1.42	0.11	0.20*	0.20*		
5 集群行为意向	5.75	1.15	0.35**	0.26**	0.44**	0.33**	
6 集群行为	n.a.	n.a.	0.15	0.10	0.34**	0.19*	0.59**

注: $n = 114$; ** $p < 0.01$, * $p < 0.05$ 。n.a.: 不适用。

2.2.3 集群行为意向与集群行为 从表 1 中看到, 集群行为意向与集群行为之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

关($r = 0.59, p < 0.01$)。进一步探究二者的关系: 由于因变量—— 集群行为是二分变量(是否签名), 做

集群行为对集群行为意向的 Logit 回归。结果显示, 回归系数 $B = 4.03$, $Wald = 24.56$, $p < 0.001$; 伪决定系数 $Cox-Snell R^2 = 0.47$; $Nagelkerke R^2 = 0.69$ 。对于 Logit 回归而言, 模型的伪决定系数大小不像线性回归中的决定系数那么大(张文彤, 董伟, 2004)。而集群行为相对于个体行为又更加复杂, 难以预测。因此, 本研究中的 $Cox-Snell R^2$ 和 $Nagelkerke R^2$ 均属于可接受水平。即集群行为意向较好地预测了集群行为。 $H1$ 得到支持。以下分析的各变量对集群行为意向的作用,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对集群行为的作用。

2.2.4 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集群行为的调节作用 为验证 $H2$, 先将集群行为意向作为因变量, 通过方差分析(ANOVA)探讨群

体相对剥夺和群体认同凸显两个因素的影响。结果(见表 2)表明, 群体相对剥夺的主效应显著($p < 0.001$), 群体认同凸显的主效应显著($p < 0.01$), 二者的交互作用亦显著($p < 0.05$)。图 2 显示对二者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当特定群体认同凸显时, 低群体相对剥夺的被试与高群体相对剥夺的被试在集群行为意向上无显著差异, 均处于较高水平, $t(45) = -1.76$, $p > 0.10$; 当一般群体认同凸显时, 高群体相对剥夺被试的集群行为意向显著高于低群体相对剥夺的被试, $t(51) = -3.77$, $p < 0.001$ 。由此可知, 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在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的条件下, 高群体相对剥夺的个体更可能参与集群行为。

表 2 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关系的影响

变异来源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p
群体相对剥夺	17.52	1	17.52	16.46	<0.001
群体认同凸显	10.36	1	10.36	9.73	0.002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	4.25	1	4.25	4.00	0.048
Error (组间)	117.07	110	1.06		

注: 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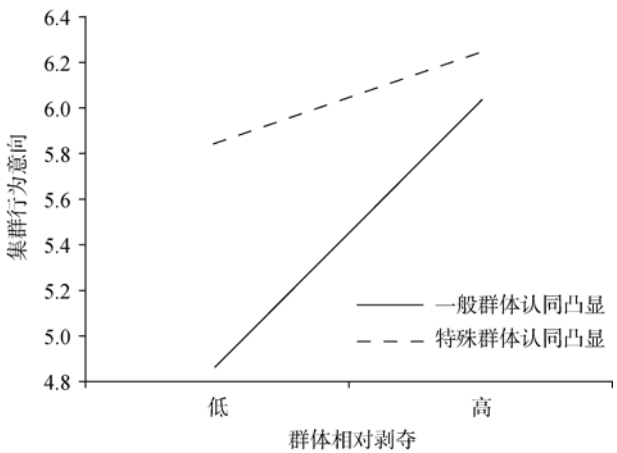


图 2 群体认同与群体相对剥夺的交互作用(因变量: 集群行为意向)

再以集群行为(签名声援维权)做因变量, 探讨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对于不同群体认同凸显下的集群行为参与状况, 见表 3 和表 4。

从表 3 中得知, 当被试凸显其 A 大学学生的身份认同时, 无论其之前所受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高低, 被试集群行为的参与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比率, 分别为低群体相对剥夺的 7/27 (26%)和高群体相对剥夺的 9/28 (32%)。作四格表 χ^2 检验, $\chi^2 = 0.26$ ($df =$

1, $\chi^2 < \chi^2_{0.5} = 0.46$)。当特定群体认同凸显时, 不同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被试参与集群行为的差异不显著($p > 0.10$)。

表 3 特定群体认同凸显下被试参与集群行为的频次统计

群体相对剥夺	参与集群行为		合计
	无	有	
低	20 (19.1)	7 (7.9)	27
高	19 (19.9)	9 (8.1)	28
合计	39	16	55

注: 括弧里为期望频次。

表 4 一般群体认同凸显下被试参与集群行为的频次统计

群体相对剥夺	参与集群行为		合计
	无	有	
低	26 (23.1)	3 (5.9)	29
高	21 (23.9)	9 (6.1)	30
合计	47	12	59

注: 括弧里为期望频次。

从表 4 中得知, 当被试凸显普通大学生的身份认同时, 低群体相对剥夺水平下被试的集群行为参与比率为 3/29 (10%), 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下被试的集群行为参与比率为 9/30 (30%), 作四格表 χ^2 检

验, $\chi^2 = 3.52$ ($df = 1$, $\chi^2 > \chi^2_{0.1} = 2.71$)。当一般群体认同凸显时, 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被试参与集群行为的比率显著高于低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被试($p < 0.10$)。图 3 直观显示了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与真实集群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 $H2a$ 和 $H2b$ 都得到支持: 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和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

2.2.5 群体认同调节机制之群体效能的影响 再探讨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三阶交互作用。先将群体效能这一测量变量以其中位数(5.35)区分为高群体效能(> 5.35 , $n = 48$; $M = 6.26$, $SD = 0.48$)和低群体效能(< 5.35 , $n = 66$; $M = 3.99$, $SD = 1.08$)两组。以集群行为意向作为因变量, 通过方差分析(ANOVA)探讨群体相对剥夺, 群体认同凸显, 群体效能三个因素的影响。结果(见表 5)表明,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和群体效

能三个自变量的主效应显著($p < 0.10$), 群体相对剥夺和群体认同的二阶交互显著($p < 0.05$), 三者的三阶交互作用亦显著($p <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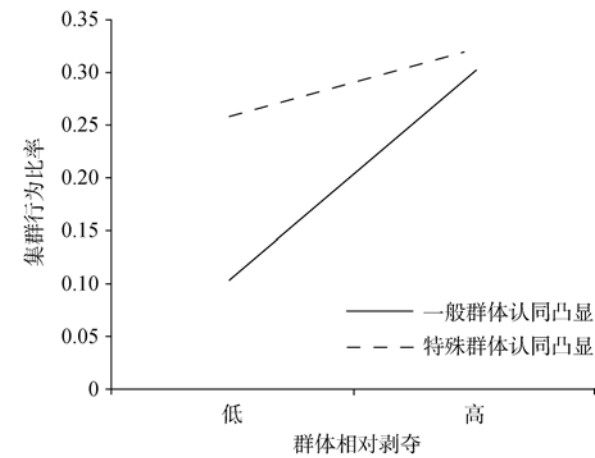


图 3 群体认同与群体相对剥夺的交互作用(因变量: 集群行为比率)

表 5 群体认同, 群体效能对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关系的影响

变异来源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p
群体相对剥夺	17.06	1	17.06	16.82	<0.001
群体认同凸显	8.83	1	8.83	8.70	0.004
群体效能	3.69	1	3.69	3.64	0.059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	4.63	1	4.63	4.56	0.035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效能	0.01	1	0.01	0.01	0.940
群体认同凸显×群体效能	0.11	1	0.11	0.11	0.741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群体效能	4.89	1	4.89	4.82	0.030
Error (组间)	107.54	106	1.02		

注: 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

由于群体效能是连续变量, 亦可使用回归分析探讨三阶交互作用。将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视为虚拟变量, 与群体效能同时进入回归方程, 作集群行为意向对这三者及其交互作用的分层回归。回归结果与方差分析结果一致: 三阶交互作用显著($p < 0.10$)。

为了更清晰地认识这一三阶交互作用, 分别探

讨在不同群体相对剥夺水平下群体认同对群体效能—集群行为意向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如表 6 和表 7 所示。

由表 6 可知, 当被试处于低群体相对剥夺水平时, 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的二阶交互作用不显著, 群体认同成为对集群行为意向有影响的唯一因素。

表 6 低群体相对剥夺下群体认同对群体效能与集群行为意向关系的影响

变异来源	Type III Sum of Square	df	Mean Square	F	p
群体认同凸显	12.00	1	12.00	8.52	0.005
群体效能	1.56	1	1.56	1.11	0.298
群体认同凸显×群体效能	1.17	1	1.17	1.14	0.289
Error (组间)	73.26	52	1.41		

注: 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

表 7 高群体相对剥夺下群体认同对群体效能与集群行为意向关系的影响

变异来源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p
群体认同凸显	0.37	1	0.37	0.59	0.448
群体效能	2.20	1	2.20	3.46	0.068
群体认同凸显×群体效能	3.57	1	3.57	5.63	0.021
Error (组间)	34.28	54	0.64		

注：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

由表 7 可知, 当被试处于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时, 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在一般群体认同凸显条件下, 高群体效能的被试参与集群行为意愿显著高于低群体效能的被试, $t(28) = -2.26, p < 0.05$; 在特定群体认同凸显条件下, 则无显著差异, $t(26) = 0.43, p > 0.10$, 见图 4。

因此, 群体认同调节了群体相对剥夺不同水平下群体效能与集群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 即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存在一个三阶交互作用。 $H3$ 得到支持。

2.2.6 群体认同调节机制之群体愤怒的作用 此前的分析已证实, 群体认同对于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那么, 这一调节效应是否通过群体愤怒的中介作用实现? 换言之, 群体愤怒

在这当中是否起到一个中介的调节作用? 如图 5 所示, 分三步对模型加以检验(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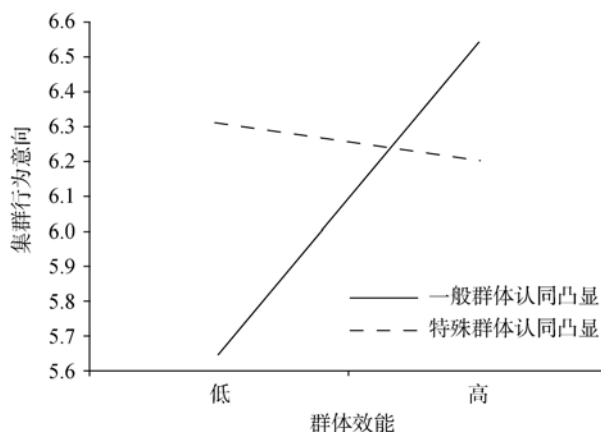


图 4 高群体相对剥夺下群体认同与群体效能的交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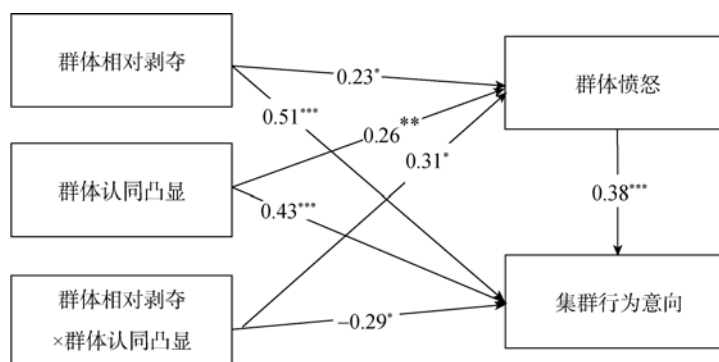


图 5 群体愤怒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首先, 做集群行为意向对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的回归,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的系数显著($\beta = -0.29, p < 0.05$), 说明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显著(与表 2 结果一致);

其次, 做群体愤怒对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的回归,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的系数显著($\beta = 0.31, p <$

0.05);

最后, 做集群行为意向对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和群体愤怒的回归, 群体愤怒的系数显著($\beta = 0.38, p < 0.001$), 但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的系数仍显著($\beta = -0.41, p < 0.01$, 图中未予显示), 故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群体愤怒而起作用。

因此, $H4$ 得到部分支持。群体愤怒部分中介了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 即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效应是通过群体愤怒的部分中介作用实现的。

2.3 讨论

本研究验证了同一触发事件情境下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比图 2 和图 3 可见, 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是相似的: 对于特定群体认同凸显的成员, 无论群体相对剥夺高低, 都有较高的集群行为意向和集群行为; 对于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的成员, 只有群体相对剥夺较高时, 集群行为意向和集群行为才更高。图 2 和图 3 的相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集群行为意向和实际的集群行为之间的高相关。同时, 本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集群行为意向可以较好地预测集群行为。这一结果的意义在于, 在实际行为难以获得的情况下, 可以用集群行为意向的测量替代集群行为。已有关于集群行为的文献中, 由于缺乏对实际行为的观测, 基本上都选择测量集群行为意向, 本研究的结果对这一普遍做法的合理性提供了实证支持。

为什么对于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的成员, 当群体相对剥夺处于高水平时, 集群行为意向会显著的提高? 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部分成员的群体效能感高。图 4 显示, 同样处于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一般认同凸显成员, 高群体效能者较之低群体效能者更愿意参与集群行为。实验中, 在本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远不如邻校背景下(高群体相对剥夺), 当得知本校部分应届毕业生所遭受到来自校方的不公正待遇时, 基于对本校学生联合起来能够维护自身权益的确信(高群体效能), 使得作为普通大学生的被试(一般群体认同凸显)仍然愿意参与集群行为。群体效能作为集群行为的外部动机(extrinsic/external motivation), 在仅凸显一般群体认同的条件下, 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高群体认同成员对群体目标的使命感, 低群体认同者的高群体效能显示了其参与集群行为的一种更加实际和功利的动机(Doosje, et al., 2002; Ellemers, et al., 1999)。

对于特定群体认同凸显条件下的成员而言, 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较稳定(见图 4)。此时来自 A 大学学生身份的群体认同感作为集群行为的内部动机(intrinsic/internal motivation; Stürmer & Simon, 2004b)通过愤怒情绪的部分中介作用引发强烈的集群行为参与意愿($M = 6.05$; $SD = 0.85$)。而群体愤怒之所以没有完全中介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关系, 可能是由于部分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的成员具有较高的群体效能, 此时即便群体愤怒情绪不那么强烈, 他们也愿意参与集群行为。

本实验的局限在于, 尚未考虑触发情境对于集群行为心理机制的影响。尽管研究所用的案例存在现实生活原型, 使被试更容易接受其真实性², 但就该案例而言, 被试既可能认为 A 大学校方的做法会影响到所有学生(此时为利益相关情境), 也可能认为案例中部分毕业生的遭遇将来不会发生到自己身上(此时为利益无关情境)。因此, 本研究所得结论在不同触发情境下推广的有效性尚需检验。实验 2 将对此展开深入探讨。

3 实验 2: 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关系的影响: 触发情境的调节作用

针对实验 1 的局限进一步考虑, 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是否会因触发情境不同而变化? 换言之, 触发情境对群体认同、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否有一个调节作用?

关于触发情境对集群行为的影响, 前人文献中鲜有将其作为一个变量来操纵的。在利益相关和无关的不同情境下, 集群行为的心理机制也会不同。进而提出研究假设:

$H5$: 触发情境调节群体认同不同水平下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

$H5a$: 对于利益相关情境, 无论凸显何种认同, 群体相对剥夺高水平的个体比低水平的个体更倾向参与集群行为;

$H5b$: 对于利益无关情境, 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 一般群体认同凸

² 据新京报 2006 报道, 因为没有签署就业协议, A 大学的部分 MBA 毕业生无法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尽管他们的学业早已顺利完成(详见 <http://news.sina.com.cn/c/edu/2006-07-05/13099379156s.shtml>)。另外, 本实验完成三个月后, 2010.09.02 期的焦点访谈即爆出湖北孝感学院就业率作假, 学生“被就业”的新闻。报道称记者调查发现, 该校规定学生必须在离校前上交就业证明和就业协议, 未上交者将被扣发毕业证和学位证(详见 <http://news.cntv.cn/program/jiaodianfangtan/20100902/104204.shtml>)。

显的个体在高群体相对剥夺条件下有更高的集群行为参与意向。

van Zomeren 等(2010)在其最新研究中已通过群际情绪和群体效能的实验操纵证实了“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的有效性,即对于某一具体的集群行为而言,基于群际情绪的情绪聚焦路径和基于群体效能的问题聚焦路径是相互独立起作用的。但其实验局限于利益相关情境。此外, van Stekelenburg 等(2009)在其研究中还发现,群体效能完全中介工具性动机(instrumental motives)和集群行为动机强度(motivational strength)之间的关系,但这只发生在权力导向型而非价值导向型的情境中。Stümer 和 Simon (2009)的研究则证实了群体愤怒对敌意型(而非工具型)情境下集群行为意向的作用。这里的权力导向型和工具型类似于本研究所说的利益相关;价值导向型和敌意型类似于本研究所说的利益无关。因此,利益相关和利益无关两种不同的触发情境下,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对于前者,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的预测力更强;而对于后者,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的预测力更强。故提出研究假设:

H6: 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在不同触发情境下有显著差异;

H6a: 在利益相关情境中,群体效能的影响大于群体愤怒;

H6b: 在利益无关情境中,群体愤怒的影响大于群体效能。

3.1 方法

3.1.1 被试 被试为 258 名北京市 A 大学大三学生。年龄在 19~24 岁($M=21.15$, $SD=0.91$),男 208 名,女 50 名。所学专业以理工为主。被试是在以“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大学生就业现状及预期”研究的名义招募中自愿参与的。

3.1.2 实验程序 本实验为 2 (群体相对剥夺:高、低)×2 (群体认同凸显:凸显特定群体认同,凸显一般群体认同)×2 (触发情境类型:利益相关情境,利益无关情境)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

所有被试被安排在同一间大教室内,整个实验期间独立活动。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八个实验条件下,共 16 组,除一组为 18 人外,其余各组均为 16 人。

实验分 4 个步骤。指导语及前两步同实验 1。

第三步,对被试进行触发情境的操纵。分别给被试呈现相关材料。利益相关情境:让被试在 10 分钟内阅读一个“A 大学将向应届毕业生征收就业

培训费”的“真实”事件报道。核心内容是校方为了弥补就业经费的不足,要求所有大四生在开学时上交每人 400 元的就业培训费。利益无关情境:让被试在 10 分钟内阅读一个“A 大学 2010 年××学院招聘门”的“真实”事件报道。该事件主角是 A 大学××学院的一名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留校应聘中受到院方的不公正待遇。之后让被试作答调查问卷四(对应两个情境,分为 AB 卷)。问卷四中包括对触发情境的操纵检验,群体愤怒,群体效能,集群行为意向等变量的测量。

最后让被试填写个人信息及保密协议。实验结束后向被试说明真实研究意图,求得被试谅解,给予被试相应报酬(30 元/人)。

3.1.3 变量操纵与测量

群体相对剥夺题项同实验 1 ($\alpha=0.71$),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

群体认同题项同实验 1 ($\alpha=0.77$),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

触发事件情境 2 个题项,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您认为 A 大学校方欲向学生收取就业培训费/A 大学‘××学院招聘门’这一事件,是否跟您目前的自身利益相关?”选项:“1 是,2 否”。

群体愤怒题项同实验 1 ($\alpha=0.91$)。

群体效能题项同实验 1 ($\alpha=0.89$)。

集群行为意向 2 个题项($\alpha=0.89$)。如利益相关情境,“如果××学院的××等同学号召 A 大学学子在其起草上呈校长的公开信上签名/每人实名撰写一封反对征收就业培训费的 email 发至校长信箱 president@cumtb.edu.cn 以示声援,您是否愿意”;选项从“1 非常不愿意”至“7 非常愿意”。利益无关情境的题项与此类似。

3.2 结果

258 名被试中,有 3 名被试部分猜测到实验意图(回答中提及“弱势”、“不利”等字眼);另有 3 名被试作答不认真,部分数据缺失。此外,有 2 名被试将利益相关情境当作利益无关情境;有 2 名被试则反之,将利益无关情境当作利益相关情境(即对于触发情境的判断有误)。故将这 10 名被试的数据删除。剩余的 248 个有效样本中,男生 199 名,女生 49 名。

3.2.1 操纵检验 群体相对剥夺及群体认同操纵的有效性检验同实验 1。结果表明,实验对“群体相对剥夺”的操纵是有效的($t(240)=-7.74$, $p<0.001$),对“群体认同凸显”的操纵是有效的($t(218)=-3.58$, $p<0.001$),且实验者对于群体相对剥夺的操纵并未

给被试带来群体认同凸显的显著变化, $t(247) = -1.32, p > 0.10$ 。

触发情境操纵的有效性通过被试对“A 大学校方欲向学生收取就业培训费”事件或“A 大学‘××学院招聘门’”事件与其目前的自身利益是否相关的判断来检验。248 名有效被试中, 被随机分配到利益相关情境下的 128 名被试均认为情境与目前的自身利益相关; 而被随机分配到利益无关情境下的 120

名被试则认为情境与目前的自身利益无关。因此, 实验者对于触发情境的操纵是有效的。

3.2.2 描述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相关 由表 8 可初步知晓, 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与因变量——集群行为意向存在显著正相关, 且总体看来, 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意向的相关($r = 0.46, p < 0.01$)大于群体效能与集群行为意向的相关($r = 0.40, p < 0.01$)。稍后的分析中会对这两个变量的作用效果详加阐述。

表 8 描述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相关(实验 2)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1 群体相对剥夺	n.a.	n.a.					
2 群体认同凸显	n.a.	n.a.	0.02				
3 触发情境	n.a.	n.a.	0.01	0.01			
4 群体愤怒	5.81	1.34	0.09	-0.08	0.04		
5 群体效能	4.97	1.54	0.03	-0.02	-0.29**	0.27**	
6 集群行为意向	5.67	1.32	0.17**	0.16*	-0.18**	0.46**	0.40**

注: $n=248$; ** $p<0.01$, * $p<0.05$ 。n.a.: 不适用。

3.2.3 触发事件情境与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意向的三阶交互 实验 1 中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机制在不同的触发情境中是否会有差异? 换言之, 触发情境是否调节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效应? 对这一三阶交互作用进行探讨。

以集群行为意向作为因变量, 通过方差分析探讨群体相对剥夺, 群体认同凸显, 触发情境 3 个因

素的作用。结果(见表 9)表明, 3 个自变量的主效应显著($p < 0.01$), 群体相对剥夺和触发情境的二阶交互显著($p < 0.05$), 群体认同凸显和触发情境的二阶交互边缘显著($p < 0.10$), 三者的三阶交互作用亦达到边缘显著($p < 0.10$)。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一三阶交互作用, 进一步分析不同触发情境下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关系的影响, 结果见表 10 和表 11。

表 9 不同触发情境下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

变异来源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i>df</i>	Mean Square	<i>F</i>	<i>p</i>
群体相对剥夺	12.21	1	12.21	7.85	0.006
群体认同凸显	11.54	1	11.54	7.41	0.007
触发情境	13.37	1	13.37	8.59	0.004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	3.30	1	3.30	2.12	0.147
群体相对剥夺×触发情境	7.96	1	7.96	5.12	0.025
群体认同凸显×触发情境	4.28	1	4.28	2.75	0.098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触发情境	4.58	1	4.58	2.94	0.088
Error (组间)	373.50	240	1.56		

注: 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

由表 10 可知, 当被试处于利益相关情境下, 群体相对剥夺和群体认同凸显的二阶交互作用不显著, 此时, 群体相对剥夺与群体认同凸显各自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也不显著。如图 6 所示, 只要被试认为触发情境与其当前的自身利益相关, 无论群体相对剥夺水平高低, 都会使得被试比较愿意参与集群行为。特定群体认同凸显组和一般群体认同凸

显组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呈现出近似平行的低斜率走势: 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被试的集群行为意向更高, 但与低相对剥夺水平的被试相比, 无显著差异(特定群体认同凸显组: $t(61) = -0.52, p > 0.10$; 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组: $t(56) = -0.14, p > 0.10$)。这说明此时的群体相对剥夺和群体认同对于集群行为意向均无显著作用, 触发情境成为促使被试积极

参与集群行为的主要因素。

由表 11 可知，当被试处于利益无关情境下，群体相对剥夺和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p < 0.01$)，且二者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p < 0.05$)。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一般群体认同凸显条件

下，高群体相对剥夺的被试参与集群行为的意愿显著高于低群体相对剥夺的被试， $t(56) = -3.37, p < 0.05$ ；特定群体认同凸显条件下，无论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高低，他们都有着较高的集群行为参与意向， $t(58) = -1.02, p > 0.10$ ，见图 7。

表 10 利益相关情境下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

变异来源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p
群体相对剥夺	0.23	1	0.23	0.18	0.676
群体认同凸显	0.91	1	0.91	0.68	0.411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	0.05	1	0.05	0.04	0.841
Error (组间)	165.48	124	1.34		

注：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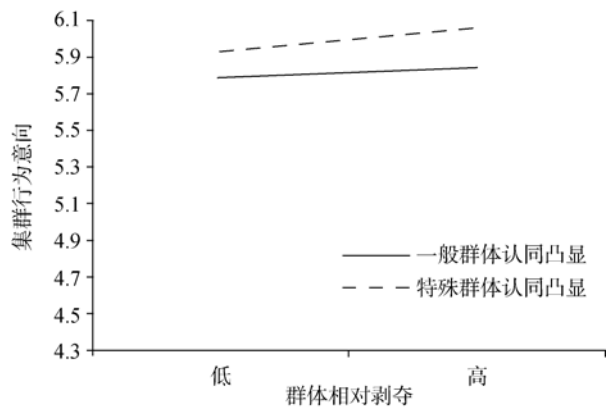


图 6 利益相关情境下群体相对剥夺和群体认同的二阶交互

综上，H5 全部得到支持。即触发情境调节不同群体认同下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于利益无关情境，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的个体在高群体相对剥夺条件下有更高的集群行为参与意向(类似于实验 1 的结论)；对于利益相关情境，无论凸显何种认同，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个体虽然比低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个体更倾向参与集群行为，但差异不显著。

3.2.4 不同触发事件情境下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作用比较 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于集群行为意向的作用机制在实验 1 已详细阐

表 11 利益无关情境下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

变异来源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p
群体相对剥夺	19.33	1	19.33	10.78	0.001
群体认同凸显	14.48	1	14.48	8.07	0.005
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凸显	7.58	1	7.58	4.23	0.042
Error (组间)	208.02	116	1.79		

注：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

述。然而，在不同的触发情境下，二者对于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实验 2 对此加以检验。

首先分析利益相关情境下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将集群行为意向作为因变量，对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12)显示：群体愤怒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33；群体效能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42。两者都达到显著水平($p < 0.001$)，Adjusted R^2 为 0.35。

同一回归模型中的两个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的差异，只说明该样本中这两个自变量影响大小，并不表明这种差异可以推及总体。因此，需要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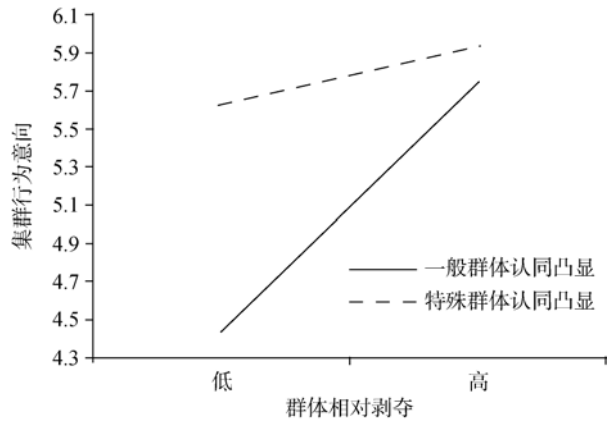


图 7 利益无关情境下群体相对剥夺和群体认同的二阶交互

表 12 利益相关情境下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

自变量	<i>B</i>	<i>SE B</i>	<i>Beta</i>	Model <i>F</i>	<i>R</i> ²	Adjusted <i>R</i> ²
				17.75***	0.37	0.35
群体相对剥夺	0.11	0.16	0.05			
群体认同凸显	0.19	0.17	0.08			
群体愤怒	0.31	0.07	0.33***			
群体效能	0.39	0.07	0.42***			

注：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n*=128; ****p*<0.001。

其系数大小有无显著差异。将群体愤怒的回归系数记为 *b*₁，为 0.31；将群体效能的回归系数记为 *b*₂，为 0.39。按照 J. Cohen, P. Cohen, West 和 Aiken (2002)的程序统计检验 *b*₂ 是否显著大于 *b*₁。虚无假设为 *H*₀: *b*₂ ≤ *b*₁(备择假设 *H*₁: *b*₂ > *b*₁)。检验统计量：

$$t = \frac{b_2 - b_1}{se_{12}} \quad (\text{公式 1})$$

其中 *se*₁₂ 就是 *b*₁ 和 *b*₂ 的联合标准误差，公式 1 的结果服从一个以 *n* - *k* - 1 的 *t* 分布。

$$se_{12} = \sqrt{se_1^2 + se_2^2 - 2cov_{12}} \quad (\text{公式 2})$$

式中，*se*₁² 和 *se*₂² 分别是 *b*₁ 和 *b*₂ 的方差，*cov*₁₂ 是

*b*₁ 和 *b*₂ 的协方差。计算统计量的结果见表 13，*se*₁² = 0.005，*se*₂² = 0.005，*cov*₁₂ = -0.001。将其代入公式 2，得 *se*₁₂ = 0.110。将 *se*₁₂ 的值代入公式 1，得：*t* = 0.764 (*df* = *n* - *k* - 1 = 128 - 4 - 1 = 123)，*p* > 0.05。因此，接受虚无假设，*b*₂ 并不显著大于 *b*₁。即当处于利益相关情境时，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无显著差异。*H*_{6a} 没有验证。

接下来，分析利益无关情境下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方法同前。结果(见表 14)显示：群体愤怒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44；群体效能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15。两者都达到显著 (*p* < 0.001)，Adjusted *R*² 为 0.36。

表 13 利益相关情境方程回归系数的协方差矩阵

自变量	群体效能	群体相对剥夺	群体认同	群体愤怒
群体效能	0.005	1.913E-5	-0.001	-0.001
群体相对剥夺		0.027	0.000	0.000
群体认同凸显			0.027	0.002
群体愤怒				0.005

表 14 利益无关情境下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

自变量	<i>B</i>	<i>SE B</i>	<i>Beta</i>	Model <i>F</i>	<i>R</i> ²	Adjusted <i>R</i> ²
				17.68***	0.38	0.36
群体相对剥夺	0.53	0.22	0.19*			
群体认同凸显	0.81	0.21	0.28***			
群体愤怒	0.43	0.08	0.44***			
群体效能	0.13	0.07	0.15***			

注：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n* = 120; *** *p* < 0.001, * *p* < 0.05。

表 15 利益无关情境方程回归系数的协方差矩阵

自变量	群体效能	群体相对剥夺	群体认同	群体愤怒
群体效能	0.005	-6.823E-5	0.001	-0.002
群体相对剥夺		0.047	-0.0001	-0.003
群体认同凸显			0.045	0.001
群体愤怒				0.006

将群体效能的回归系数记为 *b*₁，为 0.13；将群体愤怒的回归系数记为 *b*₂，为 0.43。检验 *b*₂ 是否显著大于 *b*₁，得 *se*₁₂ = 0.12。代入公式 1，得 *t* = 2.47 (*df* = *n* - *k* - 1 = 115)，*p* < 0.05。因此，接受备择假设，*b*₂ 显著大于 *b*₁。即当处于利益无关情境时，群体愤怒

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显著大于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H*_{6b} 得到验证。

综上，*H*₆ 得到部分支持。在利益无关情境中，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显著大于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在利益相关情境中，群体效能

与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3.3 讨论

3.3.1 触发情境的调节作用 实验 2 的结果揭示了触发情境因素对个体参与集群行为的作用。首先, 利益相关情境中, 个体已有的群体相对剥夺和群体认同在“人人都是受害者”的背景下不再重要, 触发情境本身就足以导致个体参与集群行为。这似乎预示着通过实现群体目标从而避免自身利益受损为主要目的的工具性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 在利益相关情境中成为集群行为的主要动机。当然, 这并不是说群体认同在此刻就没有作用, 而是被工具性价值观这一外显动机“掩盖”了。Giguère 和 Lalonde (2010) 的问卷调查显示, 在最近一次加拿大魁北克省发生的反对政府对现有学费和奖学金体系进行改革的学生罢课运动中, 群内纽带(*ingroup ties*) 这一构成群体认同的重要成分是通过工具性价值观的完全中介来影响集群行为的。其次, 在利益无关情境中, 实验 1 所得结论, 即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再次显现。对于 A 大学学生身份凸显的被试来说, 参与跟当前自身利益无关的集群行为, 主要源于群体认同这一内驱动机, 因此无论本群体面临何种困境(高群体相对剥夺或低群体相对剥夺), 都一致地表现出较高的集群行为意向。而对于普通大学生身份凸显的被试来说, 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下的被试参与集群行为的意向有显著的提高。这也说明, 实验 1 的结论适用于利益无关情境。即实验一的触发情境被多数被试知觉为与其直接利益无关。

另外, 实验 1 的触发情境看似与被试的直接利益有关(参与实验 1 的被试均为大三学生, 实验后不久就升入大四), 但从实验 2 的结果上看, 还是与利益无关情境所得的结果更加类同。这似乎暗示着个体对情境与自身利益相关性的知觉偏向于“保守”。即看似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情境, 只要不确定一定会影响到自己, 个体都会将其知觉为与自身利益无关。这或许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认识到这一知觉特性, 会对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化解有一定的实际意义。既然不同触发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心理机制不同, 倘若党政

部门能在事件发生伊始就准确地给予定性, 便可以有的放矢地选择应对: 面对利益相关型群体性事件, 需从平抚参与者的愤怒情绪和降低参与者的群体效能两方面入手; 面对利益无关型群体性事件, 重点当集中在情绪安抚上。

3.3.2 不同触发情境下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作用 触发情境对于集群行为心理机制的影响还体现在不同情境中, 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的作用差异上。无论是利益相关还是利益无关情境, 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都有显著的预测效果, 说明 van Zomeren 等(2004, 2008)提出的双路径模型具有跨情境的适用性。群体愤怒作为一种最常见的情境特异化情绪(*context-specific emotions*), 一旦被启动, 对集群行为就有明确的导向作用(Flam, 2004)。因此, 利益相关情境下群体效能与群体愤怒的作用相当也就不难理解了: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每个成员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自然同时激发了成员的群体愤怒。而在利益无关情境下, 只有那些真正对本群体有强烈认同感的成员才会参与集群行为。此时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的动机作用通过群体愤怒的中介来实现。而群体效能的高低对于高认同的个体来说已无关紧要。因此, 该情境下, 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意向的作用显著大于群体效能。这一结果与 van Stekelenburg 等(2009)在现场研究中的发现一致: 价值导向型情境下, 易导致愤怒感的意识形态动机³对集群行为的动机强度⁴有显著的预测力; 权力导向型情境下, 意识形态动机和群体效能同时正作用于集群行为的动机强度。

4 总讨论

本研究聚焦中国本土文化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 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触发情境的异同对群体相对剥夺与个体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 进一步考察了群体认同的调节效应, 以及其中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的作用。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解答了本文开始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

首先, 在同一触发情境中, 个体的应对机制会因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不同而有差异, 体现在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关系的调节

³ 根据 van Stekelenburg 在其研究中的定义, 意识形态动机(*Ideology motives*)指在价值违背(*value violation*)后为了表达某种价值观而参与集群行为的动机。van Zomeren 和 Spears(2009)认为, 该动机是促使高群体认同者参与集群行为的重要因素。价值违背后, 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道德愤怒(*moral outrage*)的体验。

⁴ van Stekelenburg 强调, 他所说的“动机强度”特指个体参与该次罢工行为的决心。近似于本研究中的集群行为意向。

作用上。一方面,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的个体在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下有更强烈的集群行为参与意向;另一方面,对于特定群体认同凸显的个体,无论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高低,都有较高的集群行为参与意向。

深入探究这一调节机制发现,群体认同对集群行为的动员作用通过群体愤怒部分中介,而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下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的个体之所以愿意参与集群行为,与成员感知到的群体效能高有关。这一结果不但与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相符,而且还将该模型扩展到了群体相对剥夺的不同水平。也就是说,加入了对集群行为发生的前提因素(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高低)的探讨,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双路径模型。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其次,在不同的触发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改变。在利益无关情境下,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在利益相关情境下,无论凸显何种群体认同,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个体比低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个体更倾向参与集群行为。触发情境的作用还表现为,在利益无关情境下,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显著大于群体效能;在利益相关情境下,群体效能与群体愤怒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可见,在探讨集群行为的心理机制时,考虑情境因素是必要的。本研究首次尝试在实验室中操纵触发情境来探究对集群行为心理机制的影响,突破了寥寥几项关注情境的现有研究仅使用现场问卷调查的局限,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实验范式上的参考。

在对不同触发情境下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作用探索中,本研究发现了比较有意思的结果。对于利益相关情境,群体效能和群体情绪同时发挥作用,二者对集群行为的影响难分伯仲:当个体的利益高度卷入时,认知和情绪会成为发动或参与集群行为的“双引擎”。而对于利益无关情境,个体的利益卷入度低,此时情绪对行为的动员作用就更为突出,而认知过程则暂时受到了抑制(这里所说情绪自然是指群体愤怒,而认知主要体现在对群体效能的判断上)。综合看来,群体愤怒这一情绪聚焦的路径对于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可能要大于群体效能这一问题聚焦的路径(problem-focused coping approach)。周洁(2009)的研究表明群体愤怒情绪在发动群体攻击行为中具有核心作用。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本研究还证实,集群行为意向对于集群行为有很好的预测力。该结果给了有关于集群行为研究测量集群行为意向的合理性以实证支持。在实际行为难以获得的情况下,可以用集群行为意向的测量替代集群行为。当然,实验中我们采用的是“签名”这一参与者付出个人努力相对较少的集群行为(low-effort collective action; Miller, 2006)或者说是温和的集群行为(soft collective action; Brunsting & Postmes, 2002)。对于罢工、游行示威等要求参与者付出较多个人努力的集群行为(high-effort collective action)或者说是激烈的集群行为(hard collective action),集群行为意向是否还有稳健(robust)的预测力,则需要进一步检验。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本文实验室研究中所使用的被试均为在校大学生,结论的生态(外部)效度尚待检验。后续研究须收集更大更广泛的民众数据,采取现场研究(field study)的方法,进一步考察本研究所得结论的可推广性。其次,研究在实验室中通过签名来收集被试集群行为的方法略显单一。实验室研究中的低努力行为是否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参与集群行为的高努力行为,抑或在现实情境中群体成员只有在签名等低努力行为无效时,才会转而采取示威等高努力行为。这些还有待今后研究的验证和探索。最后,本研究对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仅采取了测量的做法,较之操纵这些变量探明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因果关系,解释力自然不足。由于这种局限,应谨慎看待测量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所得的结果。

探明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是我国当前公共管理领域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本研究尝试将集群行为的前提——群体相对剥夺,动力——群体认同、群体愤怒、群体效能,诱因——触发情境整合进同一解释模型中,为群体性事件的早期应对提供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今后的研究,不仅应改进上述的不足,还可以加入其它的变量,如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速生规范(emergent norm)、谣言(rumor)传播等,分析从集群行为的组织机制,全面揭示集群行为的动力学特征。此外,还可以针对某些群体性事件的高危群体(如出租车司机群体⁵⁾),进一步检验本研究所得结论的适用性。

⁵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11月3日重庆主城区发生了8000多辆出租车罢运事件以来,两年间全国各地相继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出租车群体性事件近百起。

致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陈磊老师为本研究的被试招募提供了极大帮助。我们也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 考 文 献

- Abeles, R. P. (1976). Relative deprivation, rising expectations, and black militanc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2, 119-137.
- Abrams, D. (1990). *Political identity: Relative depriv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case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Initiative Occasion No. 24). London: City University,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 Ajzen, I., & Fishbein, M. (1980).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Albarracin, D., & Wyer, R. S., Jr. (2001). Elaborative and Nonelaborative processing of a behavior-related commun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6), 691-705.
- Bandura, A. (1995). Exercise of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in changing societies. In A. Bandura (Ed.), *Self-efficacy in changing societies* (pp. 1-45).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Freeman.
- Branscombe, N. R., & Ellemers, N. (1998). Coping with group-based discrimination: Individualistic versus group-level strategies. In J. K. Swin & C. Stangor (Eds.), *Prejudice: The target's perspective* (pp. 243-266).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Brown, R. (2000).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 745-778.
- Brunsting, S., & Postmes, T. (2002).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Predicting offline and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Small Group Research*, 33(5), 525-554.
- Chen, H., Xue, T., & Yue, G. A. (2010). A new categorization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behavior related concepts.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2(6), 56-60.
- [陈浩, 薛婷, 乐国安. (2010). 集群行为诸相关概念分类新框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2(6), 56-60.]
- Cohen, J., Cohen, P., West, S. G., & Aiken, L. S. (2002).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rd e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Crawford, T. J., & Naditch, M. (1970). Relative deprivation, powerlessness, and militancy: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protest. *Psychiatry*, 33, 208-223.
- De La Sablonnière, R., & Tougas, F. (2008).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imes of dramatic social change: The case of nurs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8(9), 2293-2314.
- De Weerd, M., & Klandermans, B. (1999).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protest: Farmers' protest in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 1073-1095.
- Dion, K. L. (1986). Response to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J. M. Olson, C. P. Herman, & M. P. Zanna (Eds.),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comparison: The Ontario symposium* (Vol. 4, pp. 159-179),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Doosje, B., Ellemers, N., & Spears, R. (1995). Perceived intragroup variability as a function of group status and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1(5), 410-436.
- Doosje, B., Spears, R., & Ellemers, N. (2002). Social identity as both cause and e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in response to anticipated and actual changes in the intergroup status hierarch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1, 57-76.
- Drury, J., & Reicher, S. D. (2000).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ident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9, 579-604.
- Drury, J., & Reicher, S. D. (2005). Explaining enduring empower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 35-38.
- Dubé-Simard, L., & Guimond, S. (198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protest: The personal-group issue. In J. M. Olson, C. P. Herman, & M. P. Zanna (Eds.),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comparison: The Ontario symposium* (Vol. 4, pp. 201-216).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Eagly, A. H., & Chaiken, S. (1993). *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s*.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 Ellemers, N. (2002). Social identit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I. Walker & H. J. Smith (Eds.), *Relative deprivation: Spec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pp. 239-26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lemers, N., Spears, R., & Doosje, B. (1997). Sticking together or falling apart: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s a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 of group commitment versus individual mo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617-626.
- Ellemers, N., Spears, R., & Doosje, B. (1999). *Social identity: Context, commitment, content*. Oxford: Blackwell.
- Fabrigar, L. R., Petty, R. E., Smith, S. M., & Crites, S. L., Jr. (2006).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effects on attitude-behavior consistency: The role of relevance, complexity, and amount of knowled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4), 556-577.
- Flam, H. (2004). Anger in repressive regimes: A footnote to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by James Scott. In H. Mary (E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special issue on anger in political life* (Vol. 7, pp. 171-188).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Foster, M. D., & Matheson, K. (1995). Double relative deprivation: Combining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1, 1167-1177.
- Gamson, W. A. (1975).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 The Dorsey Press.
- Giguère, B., & Lalonde, R. N. (2010). Why do students strike? Direct and indirect determina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31(2), 227-247.
- Guimond, S., & Dambrun, M. (2002). When prosperity breeds intergroup hostility: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relative gratification on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900-912.
- Guimond, S., & Dubé-Simard, L. (1983).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and the Quebec nationalist movement: The cognition-emotion distinction and the personal-group

- deprivation issu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 526–535.
- Hafer, C. L., & Olson, J. M. (1993).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discontent, and assertive actions by working wome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 30–38.
- Hinkle, S., Fox-Cardamone, L., Haseleu, J. A., Brown, R., & Irwin, L. M. (1996). Grassroots political action as an intergroup phenomen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2, 39–51.
- Hornsey, M. J., Blackwood, L., Louis, W., Fielding, K., Favour, K., Morton, T., et al. (2006). Why do people engage in collective action? Revisiting the role of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6, 1701–1722.
- Iyer, A., Schmader, T., & Lickel, B. (2007). Why individuals protest the perceived transgressions of their country: The role of anger, shame, and guil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572–587.
- Jonas, K., Diehl, M., & Brömer, P. (1997). Effects of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attitude-intention consistenc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3, 190–210.
- Kawakami, K., & Dion, K. L. (1993). The impact of salient self-identities 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ction inten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3, 525–540.
- Kelly, C., & Breinlinger, S. (1995). Attitudes,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A study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 1430–1445.
- Kelly, C., & Breinlinger, S. (199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dentity, injustice and gender*.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Kelly, C., & Kelly, J. (1994). Who gets involved in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in trade unions. *Human Relations*, 47, 63–88.
- Klandermans, B. (198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583–600.
- Le Bon, G. (1995).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London: Transac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5).
- Leach, C. W., Iyer, A., & Pedersen, A. (2007). Angry opposition to government redress: When the structurally advantaged perceive themselves as relatively deprive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6, 191–204.
- Leonard, D. J., Moons, W. G., Mackie, D. M., & Smith, E. R. (2011). "We're mad as hell and we're not going to take it anymore": Anger self-stereotyping and collective ac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4(1), 191–204.
- Li, P. L. (2005). Pay high attention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key stage of per capita GDP from 1000 US dollar to 3000 US dollar. *Study & Exploration*, (2), 7–9.
- [李培林. (2005). 高度重视人均 GDP 1000~3000 美元关键阶段的稳定发展. 学习与探索, (2), 7–9.]
- Lodewijckx, H. F. M., Kersten, G. L. E., & van Zomeren, M. (2008). Dual pathways to engage in 'Silent Marches' against violence: Moral outrage, moral cleansing and modes of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8(3), 153–167.
- Ma, J. Y. (2005). To think highly of the speculations and problems aris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GDP per capita from US dollar 1000 to 3000 in our country. *Shandong Economy*, 21(3), 12–14.
- [马静玉. (2005). 高度重视我国人均 GDP 1000~3000 美元阶段的矛盾和问题. 山东经济, 21(3), 12–14.]
- Mackie, D. M., Devos, T., & Smith, E. R. (2000). Intergroup emotions: Explaining offensive action tendencies in an intergroup contex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4), 602–616.
- Mark, M. M., & Folger, R. (1984). Responses to relative depriv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 182–218.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1241.
- McInnis, A., & Grant, P. (1991).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protest actions as a function of collectiv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Summary].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Canadi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2, 266.
- Miller, A. H., Bolce, L. H., & Halligan, M. (1977). The J-curve theory and the black urban riots: An empirical test of progressive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964–982.
- Miller, D. A. (2006). Intergroup emo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6, 1–75.
- Mummendey, A., Kessler, T., Klink, A., & Mielke, R. (1999).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Predictions b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229–245.
- Oberschall, A. (1973).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O'Brien, K. J. (2002).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China Journal*, 48, 140–154.
- Park, E. R., & Burgess, E. W.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tta, G., & Walker, I. (1992).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1(4), 285–293.
- Pettigrew, T. F. (2002). Summing up: Relative deprivation as a key social psychological concept. In I. Walker & H. J. Smith (Eds.), *Relative deprivation: Spec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pp. 351–37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ttigrew, T. F., Christ, O., Wagner, U., Meertens, R. W., van Dick, R., & Zick, A. (2008).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group prejud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4(2), 385–401.
- Pettigrew, T. F., & Meertens, R. W. (1995). Subtle and blatant prejudice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 57–75.
- Qin, Q., & Guo, X. H. (2011).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in risk society: Collective incidents in the vision of low sociology and their solution mechanism. *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125(2), 117–122.
- [秦强, 郭星华. (2011). 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法社会学视域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解决机制. 黑龙江社会科学, 125(2), 117–122.]
- Reicher, S. D. (1996).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Rethinking the context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P. Robinson (Ed.), *Social groups and identities: Developing the legacy of Henri Tajfel* (pp. 317–337). Oxford, England: Butterworth-Heinemann.
- Reicher, S. D. (2001). Crowd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M. Hogg & S. Tindale (Eds.), *Blac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 psychology: *Group processes* (pp. 182–208).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 Ru, X., Lu, X. Y., & Li, P. L. (Eds.). (2004). *Analysis and forecast o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2005)*.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主编). (2004). *2005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Ru, X., Lu, X. Y., & Li, P. L. (Eds.). (2008). *Society of China: Analysis and forecast (2009)*.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主编). (2008). *2009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Ru, X., Lu, X. Y., & Li, P. L. (Eds.). (2009). *Society of China: Analysis and forecast (2010)*.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主编). (2009). *201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Ru, X., Lu, X. Y., Li, P. L., Li, G. J., & Li, W. (Eds.). (2010). *Society of China: Analysis and forecast (2011)*.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陈光金, 李炜. (主编). (2010). *2011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Runciman, W. 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ydell, R. J., Mackie, D. M., Maitner, A. T., Claypool, H. M., Ryan, M. J., & Smith, E. R. (2008). Arousal, processing, and risk taking: Consequences of intergroup ange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8), 1141–1152.
- Simon, B., Loewy, M., Stürmer, S., Weber, U., Freytag, P., Habig, C., et al. (1998).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3), 646–658.
- Smelser, N. J.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 Smith, E. R. (1993).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emotions: Toward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prejudice. In D. M. Mackie & D. L. Hamilton (Eds.), *Affect, cognition and stereotyping: Interactive processes in group perception* (pp. 297–31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Smith, E. R. (1999).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implications of group membership becoming part of the self: New models of prejudice and of the self-concept. In D. Abrams & M. Hogg (Eds.),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pp. 183–196).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Smith, E. R., Seger, C. R., & Mackie, D. M. (2007). Can emotions be truly group level? Evidence regarding four conceptual criter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3), 431–446.
- Smith, H. J., Cronin, T., & Kessler, T. (2008). Anger, fear, or sadness: Faculty members' emotional reactions to collective pay disadvantage. *Political Psychology*, 29(2), 221–246.
- Smith, H. J., & Ortiz, D. J. (2002). Is it just me? The different consequences of personal and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I. Walker & H. J. Smith (Eds.), *Relative deprivation: Spec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pp. 91–11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H. J., Spears, R., & Oyen, M. (1994). "People Like Us:"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deprivation and group membership salience on justice evalu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0(3), 277–299.
- Stouffer, S. A., Suchman, E. A., DeVinney, L. C., Starr, S. A., & Williams, R. M.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Vol. 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ürmer, S., & Simon, B. (2004a). The role of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in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 panel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rman gay move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263–277.
- Stürmer, S., & Simon, B. (2004b). Collective action: Towards a dual-pathway model. In W. Stroebe & M. Hewstone (Ed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5, pp. 59–99). Hove, UK: Psychology Press.
- Stürmer, S., & Simon, B. (2009). Pathways to collective protest: Calculation, Identification, or Emo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group-based anger in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4), 681–705.
- Tajfel, H. (1978). Social categoriz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mparison. In H. Tajfel (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61–7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ajfel, H. (1982).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T. R., & Lind, E. A. (2002).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fraternalistic deprivation: Does group-based deprivation involve fair outcomes or fair treatment? In I. Walker & H. J. Smith (Eds.), *Relative deprivation: Spec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pp. 44–6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Tropp, L. R. & Wright, S. C. (1999).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An examination across multiple social comparis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 707–724.
- Tropp, L. R., & Wright, S. C. (2001).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s the inclusion of ingroup in the sel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 585–600.
- Turner, J. C., & Brown, R. (1978). Social status, cognitive alternativ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H. Tajfel (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pp. 201–234).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Turner, R. H., & Killian, L. M. (Eds.).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Vanneman, R. D., & Pettigrew, T. F. (1972). Race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the urban United States. *Race*, 13, 461–486.
- van Stekelenburg, J., & Klandermans, B. (2009). Individuals in movement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contention. In B. Klandermans & C. Roggeband (Eds.), *Handbook of Social Movements across Disciplines*. (pp. 157–204). New York: Springer.
- van Stekelenburg, J., Klandermans, B., & van Dijk, W. W. (2009). Context matters: Explaining how and why mobilizing context influences motivational dynamic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4), 815–838.
- van Zomeren, M., & Iyer, A. (2009).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4), 645–660.
- van Zomeren, M., Leach, C. W., & Spears, R. (2010). Does

- group efficacy increase group identification? Resolving their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1055–1060.
-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4), 504–535.
- van Zomeren, M., & Spears, R. (2009). Metaphors of protest: A classification of motiva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4), 661–679.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Fischer, A. H., & Leach, C. W. (2004).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649–664.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 Leach, C. W. (2008). Explor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llective action: Does relevance of group identity influence how people cope with collective disadvanta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7(2), 353–372.
- Veenstra, K., & Haslam, S. A. (2000).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industrial protest: Exploring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contex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9, 153–172.
- Walker, I., & Mann, L. (1987). Unemployment,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protes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3, 275–283.
- Walker, I., & Smith, H. J. (Eds.). (2002). *Relative deprivation: Spec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 M. N., Liu, L., Qiu, J., & Yang, X. L. (2011). Collective action: Defini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behavior measurement.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5), 723–730.
- [弯美娜, 刘力, 邱佳, 杨晓莉. (2011). 集群行为: 界定、心理机制与行为测量. *心理科学进展*, 19(5), 723–730.]
- Wang, C. J. (2010). Categorization of mass disturbances and their developing trends. *Yangtze Tribune*, 103(4), 47–53.
- [王赐江. (2010). 群体性事件类型化及发展趋向. *长江论坛*, 103(4), 47–53.]
- Wang, E. P. (2009).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n mass incidents. In Beijing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Circles,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d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Vol. 1, pp. 329–338). Beijing, Chin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王二平. (2009). 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分析. 见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师范大学 (编). *科学发展, 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 (上卷)* (pp. 329–338).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Wang, X. D. (2006). Prevention and defusing mass incidents by innovating interests demand mechanism of disadvantage group.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Taiyuan's Committee of the C.P.C.*, (3), 18–21.
- [王晓东. (2006). 创新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中共太原市党委学报*, (3), 18–21.]
- Wen, Z. L., Chang, L., & Hau, K. -T. (2006). Mediated moderator and moderated mediator.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8(3), 448–452.
-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2006).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 *心理学报*, 38(3), 448–452.]
- Wright, S. C. (2009).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4), 859–879.
- Wright, S. C., Taylor, D. M., & Moghaddam, F. M. (1990). Responding to membership in a disadvantaged group: From acceptance to collective pro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994–1003.
- Wright, S., C., & Tropp, L. R. (2002). Collective action in response to disadvantage: Intergroup perceptions,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I. Walker & H. J. Smith (Eds.), *Relative deprivation: Spec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pp. 200–23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u, J. R. (2009). Major types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group event in today's China.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14(6), 114–120.
- [于建嵘. (2009).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14(6), 114–120.]
- Yzerbyt, V. Y., Dumont, M., Gordijn, E., & Wigboldus, D. (2002). Intergroup emotions and self-categorization: The impact of perspective-taking on reactions to victims of harmful behavior. In D. Mackie & E. Smith (Eds.), *From prejudice to intergroup emotions* (pp. 67–88). Philadelphia, PA: Psychology Press.
- Yzerbyt, V., Dumont, M., Wigboldus, D., & Gordijn, E. (2003). I feel for us: The impact of catego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n emotions and action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4), 533–549.
- Zagefka, H., & Brown, R. (2005). Comparisons and perceived depriv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setting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467–482.
- Zhang, W. T., & Dong, W. (2004). *Senior course of SPS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张文彤, 董伟. (2004). *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Zhang, S. W., Wang, E. P., & Chen, Y. W. (2011). Relative deprivation based on occupation: An effective predictor of Chinese life satisfactio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2), 148–158.
- Zhang, S. W., Wang, E. P., & Zhou, J. (2010).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relative gratification: The motivation of Chinese mass incidents.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7(3), 95–102.
-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0). 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 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 7(3), 95–102.]
- Zhang, S. W., Zhou, J., & Wang, E. P. (2009). The antecedents of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collective actio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eople of Wenchuan earthquake area.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6(4), 69–77.
- [张书维, 周洁, 王二平. (2009). 群体相对剥夺前因及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民众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6(4), 69–77.]
- Zhao, D. X. (2006).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赵鼎新. (2006).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Zhou, J. (2009). *The effect of attitude structural consistency on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 At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周洁. (2009). 态度结构一致性对态度-行为关系的影响: 个体与群体水平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科学院.]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Different Contexts

ZHANG Shu-Wei^{1,2}; WANG Er-Ping²; ZHOU-Jie²

(¹ Center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e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²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typically involves mass incidents which refer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certain civilians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A group member engages in collective action any time that he or she act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 group and when the action is directed at improv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ntire group. This research, consisting of two experiments, focused on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underlying collective action in different incident contexts (i.e., instrumental vs. non-instrumental) which were manipulated by using scenario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group identity and incident contex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Moreover, the present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on collective a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irst, regardless of incident context, group identi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or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Specifically, when general group identity (i.e., identity with undergraduates) was salient, individuals with high general group identity we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 because group identi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group efficacy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That is, in the high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condition, when general group identity was salient, participants'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increased as their group efficacy increased; while in the low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condition, group identity did not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However, when special group identity (i.e., identity with undergraduates at a certain university) was salient, participants were very likely to engage in collective ac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increased regardless of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condition. In this process, group-based anger partially medi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roup ident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Second, incident context moder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roup identity. Specifically, in the non-instrumental incident context, when general group identity was salient, participants'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was better predicted by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whereas in the instrumental incident context, participants with high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collective action than those with low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despite of the non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dition, group-based anger predicte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more strongly than group efficacy in the non-instrumental incident context. Nevertheless,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exerted equal impact on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in the instrumental incident context.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extends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different incident contexts at distinct levels of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s a useful experimental paradigm involving the successful manipulation of incident contexts in the lab. Regarding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underlying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by examining motivation, thus informing administrators and policy makers on how to monitor and reduce mass incidents in response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group identity; instrumental incident context; non-instrumental incident context; collective action